

贺龙大传

刘秉荣
著



同心出版社

贺 龙 大 传

刘秉荣 著

(下)

同 心 出 版 社

第一百四十七章

敌后武工队

晋绥各分区和地委为贯彻“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成立了党政军民各领导参加的对敌斗争委员会，协调对敌斗争。很快，根据地掀起了“挤”敌人的高潮。“挤敌人”的斗争主要方法是围困敌人据点，骚扰敌人，开展地雷战。在反“扫荡”战斗中，干部、民兵、地方组织坚持村不离村，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方针。晋绥分局从部队和党政机关团体中抽调 320 名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加强武装工作队，使武工队由原来的 15 个增加到 37 个。此外，还派了 39 个主力连和 49 个游击中队，配合武工队进行对敌斗争。武工队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挤敌人的战术单位，是深入敌后之敌后的轻骑队。

当时要“挤敌人”还必须进行重要的情报和内应活动，这主要是据点中的地下工作人员配合。由于张稼夫在延安参加过沦陷区地下党研究小组的工作，晋绥分局分配他担任敌工部部长，负责敌占区地下工作。于是，张稼夫把晋绥边区管辖的敌

后城市和准备派赴各敌占据点的工作人员陆续召集回分局，一边参加整风学习，一边学习毛泽东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并以此为指针，总结各地的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工作的办法，然后回原地工作。从此，敌各个据点的情况，很快被了解得一清二楚。

军区确定以离石、岚县、忻县、静乐、五寨、三岔堡之间的三条公路和八分区交城以西的山地为“挤敌人”的主要方向，并在每条公路、每个据点周围都布置了武工队，开始挤这些据点。最先取得胜利的是八分区。当时，文水敌人第五十九旅团第八十三大队在交城的岔口、芝兰扎下据点后，疯狂地向四周“蚕食”。据守此据点的百余敌人，主要靠据点周围各村“维持会”供应粮食。县委即在群众自愿、政府帮助原则下，由军队掩护，把据点周围的群众全部转移到根据地，使敌陷于孤立。后经工作，岔口“维持会”人员也逃出了据点。在据点敌动摇的情况下，第八分区武装奇袭岔口，端了这个据点。此后，在三四个月內，第八分区军民共摧毁了214个自然村的“维持会”，消灭敌伪369人，基本扭转了逐步被“蚕食”的严重局面。

在武工队开始工作时，由于没有成套的经验可循，加以敌占区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因此工作很艰苦，只能白天休息，晚上到敌占区，拂晓又回到边缘来，往返一趟数十里。初期，不少武工队政策水平不高，做了一些违背群众意愿的事，如强迫据点周围群众搬家等，给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损失。武工队员牺牲，受伤的事也多发生在这个时期。如二分区武工队在围困五寨、梁家坪寨据点时，由于没有民兵配合，为达到孤立据点敌之目的，动员群众搬家。群众口头答应了，但不行动。最后，武工队强迫搬家，结果被人向敌告了密，武工队遭敌袭击，吃了大亏。二分区司令员许光达和参谋长李文清与武工队长李扬一

起总结了教训，得出结论是：发动群众要注意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一致，凡是违背群众利益的事，看来是好事，其结果也难免失败。大体上从 1942 年秋到 1943 年秋是工作最困难也是失误最多的一年。以后逐步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摸索了一些规律，出现了新局面。

在斗争实践中，各武工队都深深感到，武工队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群众工作，只有做好群众工作才有依托、有掩护，才有做伪军、伪人员工作的桥梁。另外，昼伏夜出也是武工队的特殊规律，队员们夜行军本领很强，一小时十几里不算什么。夜间活动回来，睡个上午，下午又准备晚上工作。休息大都在可靠的群众家中。到后来，各武工队和群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武工队员走到哪里也不带铺盖，往老百姓家的炕上一躺就是了。只是久而久之，身上的虱子多了起来，大家风趣的把虱子叫“革命虫”。有人还步唐诗韵作了打油诗：“春眠不觉晓，处处虱子咬，伸手摸一把，不知有多少。”吃饭也吃百家饭，穿百家衣。

晋绥边区“挤敌人”的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后，仅在 1943 年的最初三个月，军区各部队即对敌人进行大小战斗 387 次，民兵参战 222 次。在反“维持”斗争中，摧毁伪村政权 881 个，建立抗日民主村政权 555 个，使据点敌人活动范围，由一二十公里缩小到 2.5 公里以内。“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迅速地取得巨大效果，根据地军民对敌斗争由被动转为主动。

1943 年 7 月，晋绥分局召开对敌斗争会议，总结交流半年来“挤敌人”的经验教训，确定继续“挤敌人”的方针。8 月 16 日，分局发出《对敌斗争指示》。这当儿，国民党顽固派正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央军委命令吕正操带冀中军区六个主力团到延安。吕正操到达兴县时，贺龙在兴县迎他。贺龙是 8 月下旬从延安返回晋西北出席晋绥军区直属队干部会议的。贺龙告

诉吕正操，说中央电令吕留在晋绥任军区司令员、林枫任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周士第任参谋长、陈漫远任副参谋长、张平化任政治部主任。

吕正操出任司令员后，召开了各军区武工队队长会议，听取了各武工队长的汇报。尔后，吕正操说：“毛主席提出‘把敌人挤出去’，我们就要在‘挤’字上好好下功夫。挤，要使敌伪感到有压力。怎样才能使敌伪感到有压力呢？就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和日伪进行斗争。把敌占区群众发动起来，在敌人心脏里使敌人得不到八路军、游击队的消息，征集不到粮食，使日寇觉得伪军人员不可靠，使它不断遭到小的损失，使它提心吊胆，白天黑夜不得安宁；使它觉得呆不下去。这就是把敌人挤出去了。我们武工队就是创造叫敌人觉得有压力的条件，这就是武工队的工作任务。”

9月，晋绥分局召开了边区群众工作会议，决定把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和发动群众等各项工作与对敌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互相推动，共同发展。并对民兵工作提出“劳武结合”的方针。

这当儿，被挤逼之敌，乘三五八旅等主力部队西调陕甘宁边区对付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之际，又纠集兵力对晋西北发动秋季“扫荡”，企图破坏秋收，并乘机实行“反挤”。

1943年9月3日，敌第五十九旅团第八十二、八十三、八十五三个大队各一部，共1500余人，由汾阳、信义、东社、岚县、东村分别出动，向八分区的米峪镇地区进行“扫荡”。8日，各路敌军到达方山、峪口、胡堡据点集结。10日，该敌又分三路进占临县、城庄、窑头，并向临县西北的曲峪镇、第八堡、清凉寺三角地区进行“扫荡”。

晋绥军民不断伏击、袭击进犯之敌，沿途毙伤敌伪军百余名。

16日，敌第八十二、八十三两个大队共千人，经圪洞、胡堡返回汾阳等据点，第八十五大队的500余人退至白文镇扎下临时据点，向周围地区进行“扫荡”和破坏秋收，并企图袭击兴县地区的军区领导机关。

三分区军民在白文镇周围日夜袭扰敌人，掩护群众积极抢收抢藏，开展反抢粮斗争。

9月25日，敌独立第三混成旅团的两个大队自五寨、三岔堡出动，于28日分别占领保德及沙泉镇，并在附近地区进行“扫荡”。

当上述南北路敌军分别“扫荡”临县和保德地区时，第八十五大队之另一部400余人于岚县寨子集结。该敌于27日配合白文镇之敌向兴县城前进，企图再次合击八路军军区领导机关。敌军沿途遭军民连续伏击，死伤数十人，当日晚于兴县城会合。此时，我军区领导机关已转移到兴县西南15公里的小善村。敌扑空后于28日北犯瓦塘，29日进占裴家川口，10月2日晨，南犯黑峪口，并向黄河西盘塘河防阵地发炮，遭河防炮兵还击，敌死伤三四十人，退至兴县以西15公里的赵家川口。

这时，八路军各部队的分布情况是：刚从冀中军区调来的第十七团、第二十六团位于兴县西南地区；第十八团、第二十七团、第二十九团位于保德地区；晋绥军区的第二十一团和第三十六团（两个营，以下同）位于临县地区；特务团位于河西的盘塘地区守备河防。各部队驻地虽然比较分散，但集中一定的优势兵力，打敌一路仍是可能的。

贺龙判断：进犯保德地区之敌独立第三混成旅团的两个大队，兵力较多，行动谨慎，并且已在保德、沙泉扎下临时据点，不易歼灭该敌。进犯兴县地区之敌第五十九旅团第八十五大队，兵力较少。该大队于1942年在田家会战斗中曾遭歼灭性打击，

补充后新兵增多，战斗力已不如前。此次出犯将近一月，日夜遭袭扰，人困马乏，弹药大量消耗。且该敌深入根据地，孤立无援，必于数日内撤退。撤退时可能经两条道路：一条向东南经小善、大善、康宁镇，返回王狮据点；一条向东经兴县返回东村据点。

贺龙根据以上判断，决心在敌第八十五大队自赵家川口东撤时，先以连续伏击、包围手段，歼其一部，然后于沿途逐次围歼敌人。遂下了战斗命令：令第二十六团及军区警卫营在赵家川口至小善之间的小善畔设伏，阻击可能向东南撤退之敌；第十七团由康宁镇以南进至赵家川口以东的北坡村设伏，阻击可能向东撤退之敌；第三十六团（欠第二营）由临县进到小善畔至北坡村之间的康家塆待机，视敌军的撤退路线，向南或向北机动；第二十一团进至康宁镇附近，为第二线阻击部队；特务团从盘塘东渡黄河，积极袭扰与疲惫驻赵家川口之敌，并准备于敌东撤时进行尾击；第二十九团由保德地区调至兴县地区集结，准备随时机动使用。同时命令二分区加紧围困保德、沙泉之敌，六、八分区积极袭敌后方据点，破坏交通，大力牵制敌军，以配合内地作战。军区为便于指挥战斗，特设立前进指挥所，随部队行动。

第二十六团、军区警卫营、第三十六团和第十七团均于4日先后到达指定位置，进行了战斗部署。特务团两个营于4日渡过黄河后，以两个连的兵力积极向赵家川口之敌进行袭击。

5日1时许，敌由赵家川口向康宁镇方向撤退。到达吕家湾后，其主力走山路向小善畔前进，仅以100人任侧翼警戒，沿大路向冯家庄、大善村前进。拂晓，军区警卫营警戒分队在小善畔村北首先与敌军主力发生战斗。敌除一部兵力占领高地进行掩护外，其大部兵力向小善畔进攻，企图将八路军击溃。经

过激烈战斗，警卫营予敌一定杀伤后撤出小善畔。敌军继续南进。这时，第二十六团已在一二八〇高地占领有利阵地，顽强地阻击住了敌军的去路。

向大善方向撤退的敌之侧翼部队，也在冯家庄附近遭第三十六团猛烈阻击，被迫转向小善畔东北与其主力会合。

在第二十六团、军区警卫营从正面阻击敌人的同时，第三十六团、第十七团各以一部兵力积极向敌侧后进攻，协同第二十六团和军区警卫营对敌形成四面包围。激战至中午，敌机五架飞来助战，配合其地面部队猛攻一二八〇高地。指战员冒着敌人的陆空火力，坚守阵地，连续打退了敌人的五次冲击。下午，特务团赶到小善畔以北，加入了战斗。敌军被迫就地构筑工事，进行顽抗。

在敌被包围之后，附近地区的广大群众纷纷赶来参加战勤工作，许多民兵且直接参加了战斗。敌第八十五大队在军民包围下急电求援，但因其后方兵力不足，而保德、沙泉之敌又与第八十五大队相距甚远，且遭军民日夜围困，均无法前来增援。

5日夜，各部队不断袭击该敌，以疲劳消耗敌人。

6日，“前指”除命令部队继续围困敌人外，同时命令地方游击队及民兵在大善村至康宁镇17公里的大道上沿路设伏，各路口均埋设大量地雷，不断杀伤敌人；并以第二十一团埋伏在康宁镇以南的花子村，准备阻击南逃之敌；以第十七团从小善畔以北进至靠近兴县大川的木兰干、刘家梁集结，如敌向兴县方向逃跑，就地阻击敌人，如敌向南逃跑，即沿山梁进行追击。第十七团原来的阵地，由第三十六团接替。

6日下午，敌在山上焚烧尸体，并以声东击西的手段向三十六团阵地进行炮击。21时，向康宁镇方向逃窜。第二十六团、第三十六团、特务团、第十七团等部迅速尾敌追击和超越追击。敌

沿途在杨塔村、曹家坡等地数次遭游击队、民兵地雷爆炸和袭击，死伤甚众，拂晓前经过刘家庄时，又遭赶至前面的第二十六团伏击，天明后方在飞机掩护下经康宁镇继续南逃。当敌逃至花子村西南高地时又遭第二十一团和刚刚赶到花子村的特务团顽强阻击，敌被迫占领花子村背后高地。随后，第十七团赶到，与第二十一团和特务团又将敌包围起来。

7日黄昏，敌军放弃花子村背后高地，转向东南突围，遭第二十一团节节阻击，特务团和第十七团亦尾敌追击。敌逃至甄家庄东南，因人困马乏，无法逃出包围圈，被迫占领四个山头，负隅顽抗。

这时，贺龙判断该敌可能经田家会向普明逃窜，或经郑家岔向赤坚岭逃窜。因此，除命第十七团、第二十一团和第二十六团全力包围在甄家庄的敌人外，并命第三十六团赶到田家会准备截击溃逃之敌，命特务团以一部兵力在甄家庄参加围歼残敌战斗，另一部往甄家庄以东的郑家岔设伏，防敌东窜，并准备打击可能来援之敌。同时，“前指”命令第二十九团迅速赶到甄家庄参加战斗。

8日，敌机三架低空盘旋，给被围之敌空投食品、弹药，并扫射和轰炸八路军阵地，企图掩护其地面部队突围。三四天来，各部队连续数昼夜行军作战，虽很少得到食品和休息，但在战斗胜利的鼓舞下，士气旺盛，紧紧咬住了敌人。

此时，敌虽已十分狼狈，但仍不甘心其失败，一面固守待援，一面力求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8日夜21时，敌军一股百余人乘第十七团调整部署之际，绕路西窜，企图偷袭前方指挥所，以突破包围圈。当敌进至兴庄时，遭第十七团指挥所人员坚决抵抗。该团在甄家庄的部队亦闻讯赶来增援。偷袭之敌被歼灭一部，余又窜回甄家庄东南阵地。

9、10 两日，各部队不断向被围在甄家庄之敌发动攻击。敌军伤亡惨重，且外无援兵，内无粮弹，只凭飞机空投一些食品充饥，但仍拚命加修工事，企图进行垂死挣扎。这时，第二十九团已经赶来甄家庄参加战斗。军区前指为防止敌军向南突围，又于 10 日 9 时命第十七团进至甄家庄以南的安平村设伏，准备阻击敌人。第二十九团和第二十六团接替了第十七团在甄家庄的阵地。当晚，前指又将特务团在甄家庄的部队全部调往郑家岔，以加强特务团的阻击力量。

在军区各部队连续攻击下，敌军阵地愈来愈小，伤亡愈来愈大，有战斗力者已不足 300 人。该敌为了轻装突围，于 10 日下午再次焚烧尸体，并将尉官以下伤兵一并焚烧。21 时，残敌向东突围。各部队亦紧紧尾敌追击。此时，特务团已在郑家岔占据着有利地形，当敌军逃至郑家岔时，立即进行猛烈阻击。战至拂晓，敌大部被歼，仅有残敌百余人乘黑夜向山林四处逃窜，然后零星逃回王狮与赤坚岭据点。战斗于 11 日结束。该役共歼灭敌军 700 余人、伪军百余人，缴获重机枪两挺、轻机枪 15 挺、长短枪 203 支、子弹 3 万余发及其他军用品甚多，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扫荡”。

1943 年 10 月 27 日，贺龙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论甄家庄的歼灭战》一文指出：

……此次战斗的胜利，是由于我们正确的执行了毛主席“主要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抗战六年多我们执行了这个战略方针，战胜敌人，保卫了抗日根据地，已充分证明毛主席这个战略方针的正确，此次战斗乃又一次更加有力的证明其正确性。

第一百四十八章

盟军参观团到晋西北

甄家庄战斗后，敌又进行报复性“扫荡”，先后向兴县、界河口、康宁镇等地进犯，遭军区各部队的打击后，于10月24日撤退。

1943年，根据地军民由于认真执行了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对敌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收复1000多个村庄，粉碎了敌人大小13次“扫荡”，鼓舞了士气，振奋了民心。根据地出现了蒸蒸日上的新气象。

为庆祝胜利和总结经验，晋绥分局于1944年1月召开了晋绥边区第三届群英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各条战线的英雄130名。白如冰致开幕词，吕正操、武新宇、刘少白讲了话。会上介绍了宁武县张初元“劳武结合”的经验和离石、岚县、神池、静乐四县武工队的经验。林枫作大会总结，他指出：张初元创造的变工组与民兵相结合的形式，不仅解决了对敌斗争与发展生产的矛盾，而且密切民兵与群众的关系，巩固了变工组，这种

劳武结合的形式,适合于敌后人民坚持斗争与发展生产的要求。大会评出了张初元、温象栓、刘文锦等五名特等英雄。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晋西北民兵英雄、劳动英雄张初元更是劳力与武力结合的范例,他在民兵的组织上来了一个革命……张初元的出现是敌后的一件大事,说明敌后人民不但学会战斗,而且开始学会了把战斗与生产结合起来。”

这当儿,日本侵略者为准备豫湘桂战役,打通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以连接大陆交通线,从各地抽调兵力对正面战场重新发起进攻。晋绥地区的敌第五十九旅团大部调走,由新组建的八十三旅团接替,独立混成第四旅团调走,由新编独立步兵第十旅团接替,总兵力减少2.27万人,战斗力大减。

为进一步“挤”敌人,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发出了《1944年对敌斗争工作的指示》,提出了继续“挤敌人”的方针。即“向下钻,深入群众工作;向前钻,开展伪军、伪组织工作;要从困难着想,作长期打算,巩固已有成绩,逐步地、有阵地地向前发展。”并号召各分区学习武工队以冷枪组不断袭扰和联防围困的方式挤退蒲阁寨敌人的经验,要求各分区加紧围挤敌人的据点。并决定各武工队统一由县委直接领导,全区武工队由37个增加到39个;另有16个连和32个游击中队,配合武工队活动。塞北分区也陆续派出小部队和工作队,进入绥南和绥中,逐渐恢复大青山游击根据地。

从1944年1月到6月,晋绥军区军民采取联防围困、地雷爆炸、破坏交通运输、实行经济封锁、开展政治攻势等办法,共挤掉敌伪据点58个,收复村庄2655个,解放人口36.45万人,根据地继续得以恢复。7月23日,中央军委电示吕正操、林枫,要晋绥军区各军分区同时或先后动员主力军、游击队及民兵,从8月中旬至9月底,大举袭击日伪军。以8月上半月为动员准备

时间，8月15或20日至9月底为袭击时间。袭击应多捉俘虏，多缴敌件（武器、被服、文件、日记本等）。并指出，在进攻前须作充分准备，进攻时善于选择薄弱点，进攻后准备对付敌之报复“扫荡”。

遵照中央军委的电示，晋绥军区决定发动秋季攻势战役，拔除一些能克之敌据点，扩大根据地，争取切断离岚、汾离、静宁三条公路交通线，为进一步把敌人挤出去创造条件。军区政治部指示各部队开展学习对敌斗争英雄刘笃庆和工作模范安骏运动。从8月下旬起，秋季攻势在各军分区陆续展开。8月28日，第八分区第二支队袭击忻静公路的利润据点，俘虏了全部日军。翌日，第二分区第三十六团袭击五寨以南南风子据点，继尔第六分区部队收复了沟口据点，切断了宁化堡至静乐的交通。第三分区部队化装奇袭胡堡据点，收复马坊，袭入开府。同时，第八分区部队也一举袭占峪口、横泉据点。至此，八路军将离岚线拦腰斩为数段。到9月底，晋绥军区各部队又攻克和挤退敌据点48处，毙伤日军499名，伪军410名，俘日军26名、伪军1014名，收复村庄446个，解放人口5万多人，收复土地770余平方公里。

在此期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长期封锁，到延安访问。其中一部分于8月30日到达晋绥边区，对晋绥军区军民坚持敌后抗战进行了实地考察。成员有美国《时代》杂志的记者卡期堡，纽约时报联合劳动新闻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美国合众社记者福尔曼，英国路透社记者武道等。盟军记者团受到了吕正操、林枫的欢迎。吕、林向他们介绍了根据地对敌斗争、经济建设、政治民主实施等情况。记者团所到之处，皆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9月6日，记者团到达了八分区参观，在八分区领导人罗贵波等带领下，记者团参观了

地雷网保护下的八分区战地医院和兵工厂及俘虏管理所，又实地观看了八分区部队攻打汾阳城和协和堡、娄烦敌据点的战斗。外国记者登上距离汾阳仅10公里的边山顶峰，亲见浓烟笼罩全城，又见日军惊慌逃避和钻进碉堡不敢应战的狼狈相。9月16日，记者团亲眼观看了罗贵波指挥的拔据点的战斗。军民经过一个小时的战斗，即将据点拔掉。战斗中还俘虏了几个日本人。外国记者还同在协和堡抓获的日军俘虏进行了交谈。虽然这次战斗规模不大，俘虏和缴获的数目也不大，但给记者团的影响很深。爱波斯坦在前线对战士们讲：“你们不但使不了解八路军的人了解了八路军，并可将诬蔑八路军的人的面目揭穿。”

之后，记者团又到了三分区三交敌据点附近，参观民兵英雄郭秉旺等大摆地雷阵、对敌碉堡进行爆炸封锁的情景。盟军记者团在晋绥边区访问了一个多月，深为人民群众和抗日军队间的团结挚情所感动，他们称颂八路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军队。在离开晋绥边区之后，他们根据亲身体验撰写文章，客观地报道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对敌斗争情况，揭穿了国民党报纸散布的八路军在敌后“游而不击”的谎言。武道发表在《太美晚报》的一篇文章中说：“关于十八集团军是否在和敌人作战，我能回答‘是的’。我在晋西北看见了这样的战斗，看见了受伤和阵亡的中国士兵，而且和被俘的敌军和伪军说过话，就在他们刚刚被俘的几小时。”

福尔曼在《北行漫记》中写道：

使日本人不出来的顶顶常用的一个方法，是在一切据点的附近安放好千百个地雷。我记得有一个乡村，那边的地雷战进行得如此成功，甚至使他们决定要根本把附近的据点的威胁一扫而空。日本人据点四周是

一片地雷阵地，民兵日夜守着哨位，防止日本人突然出来。他们连最后的水源已经非常缺少了。我们问村民要不要我们的军队停下来，帮助他们攻城。“不，不，我们自己会干的。”回答是这样。十天之后，我们听见了他们自己干的消息：他们进攻了被围的据点，脆弱不堪一击的警备队简直没有作什么抵抗。他们的人一半被杀死，还有一半投降了。……

爱泼斯坦还单独访问过林枫，林枫向他谈了对敌作战、劳武结合、变工队等等方面的情况。爱泼斯坦在《我认识和了解的林枫同志》一文中写道：

我在晋绥边区的采访，印象最深刻的是对林枫的访问。他关于党的工作的谈话，展示了一幅在党的领导下，军事、生产、政治和群众文化工作协调一致的清晰图景。他的谈话不但肯定了我们通过自己的观察所得到的感性认识，而且帮助我们提高到理性认识的水平，形成了有扎实基础的对前途的乐观信念。难以忘怀的，还有林枫同志本人。他那深沉的爱国心（这是长期沦陷的东北儿女特有的强烈的爱国心），他的严肃、诚恳和明晰。……他穿着极简朴，按那个严峻岁月的生活标准也是突出的。他体魄魁梧，强壮，略弓的背和脸上的皱纹是日以继夜工作的见证。他声音低沉，谈话从容不迫，不使用戏剧性的或强调的语气。虽然外表看去是显得疲倦，但他谈话的逻辑和说服力比雄辩的演说更有力量。

爱泼斯坦还描写根据地民众的对敌斗争情况：

我们从司令部出来，经过几个月前七百合个日本人被袭击的战场。我们见到了日本人冲出八路军包围以前最后挣扎的据点以及他们埋葬战死者的地方。参加这次战斗的八路军指挥员恰好与我们同行，他生动地给我们讲解了当时战斗的情形。他的话充满神奇的描述——例如，他们知道日本人不愿意遗尸野地，就放一个地雷在日本人尸体下面。当一个日本军官夜间带领一小队人来收尸时，地雷爆炸了，当即就把那军官以及其他五个士兵炸死了。

司令员告诉我们说，八路军把这次行动预先告诉了人民，民兵领着正规军抄小路截击帮了大忙。我们在一个村里停下来和这些民兵谈话。他们一共八个人，正在变工队工作，其中两个人有步枪，其余的只有手枪。这些枪支是前年他们在战场上缴来的。有个带步枪的人说，上次日本人打来时，他身边只有十二颗子弹。

“我对敌人放了四枪。”他说，“我根本不能控制住自己不开枪。”不，他决不认为这四粒宝贵的子弹打不中任何一个日本人。他笑了起来，因为日本人连本带利又间接地偿还给他——他在一个日本人的尸体上得到一满盒子弹。

民兵防守每一条道路，每个岗位都在彼此的视线以内，没有路条的人是不准通行的，即使和我们同行的军人也得被检查。在一个路口上，有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带着和他一样高的大刀站在路中间。他要